

改革开放 30 年我国经济建设巨大成就及 基本经验和教训

2006 年我在北美做访问学者,当时在那里的学界、民间之中听到的最多的声音就是中国将会是下一个超级大国。在最近几年,世界上有关中国崛起的评论更是不绝于耳,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溢美之词也不断出现。从金砖四国,到 G20,甚至 AmeriChina 等。对于这些评论我们不能过分认真,因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自身的发展任务还很重,问题很多,道路漫长。但从中我们却可以准确无误地解读到一个信息,那就是中国已经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只要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下去,中华民族就能够实现百年的复兴之梦,中国就一定会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会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一节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因分析

一、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回顾和反思

改革开放的 30 年以来,我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巨大的成就。到 2008 年,我国的 GDP 为 300670 亿元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计,约合 4.39 万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进出口总额 2.6 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当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900 亿美元,已经连续 17 年位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 2 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

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因为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就曾经是世界经济大国。2010 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文章描述道:“中国不但在有记载的历史的多数时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且直到 15 世纪,它也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英国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2007)进一步揭示了这一问题:实际上,早在公元 10 世纪时,我国在人均收入上就已经领先世界各个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延续到 15 世纪。无论是在科学技术水平上,还是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以及对辽阔疆域的管理能力上,我国都超过了欧洲……

如公元960年,我国人均GDP为450美元,而欧洲当时为422美元;到1300年,我国的人均GDP为600美元,欧洲为576美元。我国的经济总量曾很多年雄踞世界第一。到1820年时,我国GDP占全世界的份额为32.9%,而当时整个欧洲仅为26.6%。在这以后,欧洲才在人均收入、技术和科学能力上逐渐超过了我国。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当世界经济明显增长之际,中国却衰退了。

在19世纪开始时,我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落伍了,陷入了经济落后,任人欺辱,被世界称为“东亚病夫”的衰败境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才使中国人摆脱了屈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再一次屹立起来,在主权和政治上有了自己的尊严。是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了富裕之路,在连续的30多年中,奇迹般地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在总量上,我国又一次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我国再次傲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梦想已不再遥远。我国一定会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对于我国30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全世界都有评论。OECD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Javier Santiso(2007)这样评论中国:“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在过去二三十年中迅速地扩大,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事实。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个威胁,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希望所在,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不解之谜”。对于如何破解这一迷局,Javier Santiso进一步说到,安格斯·麦迪森对我国经济在过去的一千年中的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也对未来1/4个世纪的前景进行了预测,他的研究向我们揭示了,早在公元10~15世纪早期时,我国的人均收入就要高于欧洲;而且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直到其衰落之前,她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因此,她在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期间所取得的非凡进步,是一个复兴,而不是奇迹……我们所追求的是加强对各国繁荣和衰败的理解,从而通过对政策的改善来推动增长,普及繁荣。

去探究“中国振兴之谜”是为了提醒国人更加客观地了解我们国家的过去和现在,并从中反思,去找寻那些在历史长河中影响中国兴衰的主要基因,总结过去30年的经验和教训是为了未来,为了中国在21世纪能更好、更快地科学发展,应对各种挑战,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华民族面临着一系列更加艰巨的任务,我国经济要保持继续可持续稳定发展,改革和发展中新涌现出来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我国要更加深化地融入世界经济,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在新的形势下,我国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金融危机的隐患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后年代的世界经济格局更为复杂,传统的增长模式遇到挑战,贸易保护主义有蔓延的趋势,人类发展的资源频频告急,生存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在种种危机面前,人类面临着新的选择,世界经济面临着新的布局的调整、新型发展模式的探索。除了要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之外,我国更是需要妥善应对世界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以后的观察和质疑,要妥善解决改革和发展以后国内新出现的各种经

济和社会矛盾,要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这些都将是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全新战略性课题。

面对这一系列纷繁复杂的问题,应该抓住主要矛盾,首先要搞清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从更长的历史长河去追溯和探寻,是哪些基本要素造就了中国曾经的辉煌?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近代的落后?从当代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30 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经验是什么?我们应当坚持什么,有哪些教训应该吸取?

在我国科学发展的诸多问题中,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课题。在过去的 30 年中,为什么在中国内部,各区域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如此之大?如果说主要是区域的资源禀赋造成的,那么同样是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增长的差异也是很明显。比如到 2008 年底,广东省人均 GDP 为 37588 元人民币,相对于 1978 年,增长了 42.8 倍。而同是东南沿海开放地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均 GDP 为 14966 元,相差一倍还多,排名在全国 20 位以后,相对于 1978 年增长了 23 倍。有人说高速发展区域是由于国家赋予了其超前发展的特殊政策——如经济特区的建立所造就的。但实际是有些并没有享受到特殊政策的区域,比如浙江省,在改革开放前,经济表现平平,但到 2008 年,人均 GDP 达到 42214 元,增长了 60 倍。从 1978 年在全国排名第 19 位,一跃而冲到 2008 年的第 4 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这 3 个直辖市,在省域经济中排名第一。解读这一迷局,既是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是解决好未来发展中一系列问题的基础。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30 年高速的经济发展对世界可能是一个奇迹,对我们自己则是一面镜子。30 年后的今天,到了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的时候了,30 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实现了,但增长中所积累的社会经济矛盾却越来越突出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我国的未来需要科学的发展。但什么是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的具体路径是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搞清下面一系列的问题:30 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经验是什么,有哪些教训,哪些应该坚持,哪些应该纠正,如何在未来实现科学发展?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亟须廓清和解决,未来的科学发展需要更加明晰的发展道路和缜密的科学规划。

30 年前,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尝试和改革绝对是必要和正确的,30 年后的今天则必须有更加清晰的科学发展思路,不能再犯大的错误,否则就会使问题越积越多,积重难返,酿成大的历史悲剧。如果说过去 30 年发展更多的是需要激情和胆略,那么未来的发展则需要更多的理性和思考,需要国人对科学发展达成共识。特别是对于那些发展暂时落后的区域和领域,更需要从中反思,以便在今后更好、更快地科学发展,后来居上。

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矛盾和动因

为了搞清影响中国兴衰的基本要素,需要从更长远的历史视野,更广阔的社会

经济环境和人文背景纵横两个维度去思考和分析问题。并且需要在纷繁复杂的诸多因素中抓住主要矛盾。这就需要从两个方面去把握规律:一是要从更长的历史长河中寻找那些影响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规律。二是要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寻求一国如何依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条件,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地提高自身的资源配置效率。按照这样的思路,就要求我们从战略的角度,去研究那些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因素,基本规律,抓住主要矛盾。我们尝试着从这纵横两个方面去抓住那些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问题和主要矛盾。在这其中有两个问题特别重要,一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生产经营效能,这决定了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它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组织的生产效率。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这一问题主要是由一个民族的基本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生产组织模式所决定的。二是在全球经济市场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一个国家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全世界配置资源的能力。这主要是指一个国家依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效率。它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否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实现本国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自身的生产经营效能。这一问题主要由一个国家融入国际大市场的深度以及其影响和掌控国际经济的能力所决定。

对于中国的发展,也要按照这一脉络,去搜寻规律。

(一) 人类社会生产组织模式的探讨

在国家的范围内讨论问题,人类的生产效率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人的素质和能力;二是社会生产的组织效率。当人类进入社会化大生产之后,如何让全社会劳动者都能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并充分发挥每一个劳动者的积极性,进而形成全社会的生产效能,就成为一个国家生产效率高低的最根本的问题。而社会生产组织模式的优劣又是决定社会生产效率的首要因素。

因此,当回顾历史,分析经济增长问题的时候,应当首先从这一基本问题入手。回顾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5世纪以后,欧洲在经济上的超越有几个主要的原因。一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文化革命和思想解放,使欧洲人逐渐挣脱了皇权和宗教的束缚,认识到自由、平等、科学对人类的重要意义,并普及了这种思想。伴随着这种思想基础的深入人心,也催生了人类建立新型的生产组织体系的萌芽。二是应运而生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模式的建立。这种新型的生产组织模式特点是追求起点平等,进出自由,大众参与,鼓励自由竞争,重视资本积累,优胜劣汰,推崇在竞争中发展。这种新型的生产组织体系充分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三是在这种思想和体系的基础上所伴随而生的现代教育体系和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在这其中,核心是公众参与,自由竞争的生产组织体系的建立。正是这种基本

的生产组织体系的动力和创造力才推动了西方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推动了这些国家产业和经济的不断升级,创造了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对此马克思曾有描述:“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继承了以往社会所创造的所有生产力”。

我国经济社会繁荣的思想基础应当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由于竞争的存在,导致了诸子百家的学界繁荣,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由此也带来了文化的大繁荣和思想的大解放。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奠定了影响中国长达2000年的思想政治体系。这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思想体系和社会精英治理国家的政治体制。这种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讲究秩序,社会各成员各就各位,分工明确,恪尽职守。这种文化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在这种思想体系下又建立了以社会精英为主体的官僚行政管理的社会组织体制。在经济方面,由于当时我国的疆土辽阔,人口众多,而官员相对较少,所以在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生产组织体系相对独立。

在中国农业社会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国情特点,中国的生产经营活动逐渐形成了一套近乎制度安排的基本模式。安格斯·麦迪森(2007)这样叙述到:在宋朝与明朝交替之间,中国农业转向了一个拥有生产与经营自主权的自耕农和佃农为主的土地制度,自耕农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在地方上出售他们的农产品。这就是说,当时的中国农业已经形成了一种基本的制度架构。这种制度基本上是以自耕农和佃农为主体的独立生产、自主经营的小生产组织模式。官僚和地主是基本上不参与生产和经营的吃租人,佃农在交够地租之后能够享受剩余的劳动成果。这种生产组织模式的特点是生产者独立生产,自主经营。生产者生产的粮食、布匹和手工业用品同自身的收入紧密挂钩,劳动成果看得到,可计量,能享受。因此能够充分调动他们的劳动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很高。这种基本的生产组织模式辅之以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的中国人的聪明、勤奋和坚韧不拔,就造就了中国经济史上的辉煌。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模式还是中国式的小生产组织模式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都存在着大众平等参与,生产者自主生产经营,社会群体自由竞争的制度环境。在这样的生产环境下,准入门槛低,生产者可以平等自由进出;生产经营者内部的激励机制是生产成果与自身的劳动挂钩,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而外部由于自由进出的机制保证,存在着自由竞争,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老板”,但每一个老板又都时时面临着新进入者自由竞争的压力,因为,在生产经营中始终会有更好的有可能会超越你,而你不得不出局。在这种竞争环境中,每一个人都想创业,创业者层出不穷;但同时外部的竞争压力又逼迫每一个创业者不敢有丝毫懈怠,始终保持生产经营的原动力和创造力。而这种自由进入、公众参与、平等竞争的氛围和环境正是这种模式的巨大优势。

但十分遗憾的是,这两种生产组织体系都没有一套保证这一优势环境能够坚持下去,并不断完善的自身机制。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会竭力打破自由竞争的局面,创造和维护自身强于他人的优势地位,攫取超额利润。社会生产活动会逐步发展成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 and 核心资源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加重了对广大劳动者的盘剥而失去效率。中国的自耕农和佃农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组织体系会由于官僚和地主不断地加重对劳动者的盘剥,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佃租越来越重,广大劳动者最终会由于“劳无所获”,而演变为依附土地的奴隶,丧失生产的积极性。

纵观历史,从人类经济发展兴衰的轨迹看,凡是当遇到自由竞争机制模式坚持比较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生产力就会大发展,经济就会繁荣;反之生产力就会得到抑制,经济就会停滞甚至倒退。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就是,凡是土地分配相对均衡,官僚和地主对农民盘剥较轻,广大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就有较快的发展,政治也会稳定;反之则会停滞甚至倒退。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粮食定,天下定”,“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治国思想正是这一深层次原因的现象表述。在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时刻不能忽略这一主线。

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之所以将这种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所构成的生产组织关系称为社会生产组织模式是因为即使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生产关系确立之后,也会由于所采用的社会生产组织模式不当,会导致组织效率低下,生产力落后,经济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改革了传统的社会生产组织结构,使之回归了以劳动者为本位的科学的社会生产组织模式。

(二) 近代对外开放对中国的影响

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另外一个重大的动因就是对外开放。随着人类经济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大,超越疆界,遍布全球的时候,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均衡配置就成了决定社会生产和经营效率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

社会化大生产不仅要求个体生产的效率,还要求社会生产的协调发展和资源的合理配置。这就要求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生产和需求的有效结合。而社会历史证明,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式只能是市场化。因为只有自由市场化的配置,效率才会更高,生产才能匹配需求。而随着优化配置的要求逐步从区域拓展到一个国家,又从一个国家走向全球时,就提出了商品和生产要素全球化配置的要求。这就是经济运行市场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的发展趋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际化又成了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哪个国家更加善于完成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他们的经济就更有效率,国家就会

更为发达。而那些不善于利用市场和世界资源的国家就会落后。

我国的国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到了近代,随着人口的急剧膨胀,资源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到了清朝的乾隆时代,我国人口就已经达到 3 亿人,而到了太平天国时期又膨胀到 4.5 亿。人口众多,而资源不足,导致了生产要素配置的不平衡,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受制于有限资源的约束,不断激化了社会经济矛盾。单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考虑,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就是对外开放,利用全球的资源和市场来解决我国资源和生产要素失衡的问题。在实践中,我国近代的经济发展整体上也呈现出东部沿海发展较快,经济发展由东到西,由南到北梯次推进的格局。主要原因也是东部沿海可以更方便地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技术,和更便捷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来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也正是由于这一基本原因,在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年来,我国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有了扩大的趋势。如到 2008 年,东部的上海的人均 GDP 达到 72684 元,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西部一些区域还面临着脱贫的问题。在新世纪,我国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也是我国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综上所述,分析我国 2000 年,特别是最近 30 年的经济发展问题,就必须围绕两个主线——改革和开放。

我国新一轮经济振兴始于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这期间一些大的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是新中国的制度革命奠定了保障生产要素平等分配的基础,二是改革使劳动者回归了市场主体的原本地位,能够平等自主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和生产要素,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效能。这些变革将曾经束缚在广大劳动者身上的枷锁打破,生产组织模式再一次回归到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劳动者本位”的体系上来,充分释放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典型的事件有土改时的分田到户,平均地权,改革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城市的企业经营体制改革等。

还有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推进了我国与国际经济发展的融合,借鉴吸收了人类进步的最新成果,优化了资源配置。在我国的近代史上,中国社会一些大的社会进步都是始于对外开放。在近代史上,对外开放对中国的影响更为重要,因为它除了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之外,还是我国改革内部积弊的催化剂。为此,我们下面首先从对外开放入手,分别来具体分析和解释这两大问题。

第二节 对外开放使我国嵌入到国际经济的循环中, 优化了自身的生产要素配置

在人类成长的历史上,中国人曾经创造过许多辉煌。但在近代史上,中国人却落后了。落后的原因很多,但人口的急剧增长,资源匮乏以及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

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大革命后做出了关于党的中心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我国从此走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道路。但当时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口负担与资源和市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资金、资源和市场等瓶颈问题不断困扰着经济发展计划。

一、只有对外开放,才能有效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衡的问题

在近代,由于人口的急剧膨胀,人口多,而资源少的问题一直是亚洲一些主要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比如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主要生产要素占世界总量的份额分别为:劳动力 23%,土地和淡水等不可贸易的资源仅占 4%~7%,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储量仅为 3%~4%,固定资产投资不足 1%,研发投入 0.5%。人口过多,资源严重不足。在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全世界 22.3%的人口,但创造的 GDP 却仅仅占世界总量的 1.75%,有效需求也严重不足,国内市场狭小。全社会劳动者人数约为 4 亿人,有超过 3 亿多劳动力是农民,失衡的资源配置导致这些劳动力不得不被动地蜗居在 14 亿亩有限的耕地资源上低效地劳作。由于资源的约束,我国的农业劳动者每年人均劳动生产率仅为 520 元人民币。我国经济发展中人口负担过重,但资源和资金紧缺的现状极为突出。世界甚至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质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市场的消费需求在稳步增长,美国、欧洲创造了全球财富的 50%,消费需求和市场稳步增长,但劳动成本也越来越高。资源和生产要素配置国际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日本在战后正是适应了这种趋势,解决了战争没能解决的资源性短缺问题,成功地实施了国家层面的国际化生产和经营,而一跃跻身到发达国家行列。

随着国际分工的演变,那些生产消费品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劳动成本的不断上升,制造业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在改革开放初期,按制造业工人每周 40 个工时的每月薪酬计算,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大约是 2000~3000 美元,韩国、我国台湾和香港等地大约为 1000~2000 美元,而当时的中国为不到 100 美元。也就是说雇佣国外一个工人的成本在我国可以雇佣几十个。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薪酬更为低廉。即使这样微薄薪酬的劳动岗位,也为当时广大的农村劳动者所醉心向往。

很显然,当时的中国有着过剩的劳动力,但缺乏资源、资本和市场,发展道路面临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任务。从世界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讲,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只能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大市场的循环,这样才能扭转中国自身生产要素配置扭曲的局面。

我国国内的经济的发展也急需由农村向制造业转移过剩的劳动力,参与国际经

济的交换,换回资金和资源,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并依此来带动产业的升级。但当时的中国既缺乏资金和资源,又几乎没有具备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运作的企业家,来组织资源的配置。长期的闭关自守导致中国在教育、科技、生产方式等方面都极其落后,缺乏了解国际经济运作规律和规则的人才,很难参与国际竞争。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转轨必须借助外力来催化。而当时的世界经济形势也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机遇,即国际上成熟的制造业在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造成本也面临着不断上升的压力,制造业需要寻求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和地区。在这种形势下,对外开放,吸引外国的资金、技术、经营管理、资源等生产要素进入我国,也成了当时我国发展经济所面临的必然选择。

二、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做法和巨大成就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在我国经历了“文革”的痛苦和反思之后,我国领导人顺应了时代的历史潮流,果断地实行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首先从东部沿海起步,建立了经济特区。以后逐步扩大开放面积,走向国家全面开放。也正是由于对外开放,在一段时间里,招商引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就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旋律。外力的拉动也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些主要事件见表 1-1。

表 1-1 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大事年表

时间/年	政 策	实行区域
1980	建立经济特区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1984	建立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上海、天津等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
1985	建立沿海开放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珠三角、长三角、福建厦漳泉和主要中心城市
1988	建立海南经济特区	海南省
1989	建立台商投资区	沿海城市
1990	建立保税区	沿海城市
1991	建立上海浦东经济特区	上海
1992	建立沿边、沿江开放城市	沿边、沿江城市
2000	建立出口加工区	三沿城市
2001	中国加入 WTO	全面开放
2006	天津滨海新区的全面开放	天津
2010	重庆综合改革实验区	重庆

注: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从以上事件回顾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开放是逐步地由南到北梯次推进,渐进地展开的。30 年的发展实践也证明,凡是对外开放搞得好的区域,经济发展就快于其他区域。正是对外开放优化了中国自身的资源配置,发挥了中国劳动力的比

较优势,才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 1978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仅为 206 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换算,仅占 GDP 的 8%,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0.79%。到了 2008 年,进出口总额就达到 2.6 万亿美元,占到当年 GDP 的 59%,占世界贸易总额接近 10%。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为 17.4%,而同期的 GDP 年均增长为 15.8%。由于对外开放的拉动,我国人均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 381 元人民币,增长到 2008 年的 2.3 万元,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4761 元,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5781 元。城市劳动力从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25% 上升到 45%。改革开放以来 30 年的建设成就已经使中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迈出了决定性的坚实步伐。

30 年来我国突出的发展成就与对外开放息息相关。如 1978 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为 206.4 美元,当年 GDP 为 3645.2 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计,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为 8%。到了 1985 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为 20.2%,1995 年则达到 30%,到了 2006 年更是达到 63.8%。而处于对外开放前沿的沿海城市外贸依存度更高。如上海 1996~1999 年外贸依存度由 62.6% 上升为 76.3%,2001 年为 95%,到了 2006 年则更是达到 174.9%,而按口岸进出口总额计,外贸依存度则为 331.9%。特别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就是一个典型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例子。1979 年深圳市工业总产值仅有 0.71 亿元人民币,1985 年就达到了 24.67 亿元人民币,1995 年达到 1292.21 亿元人民币,2007 年为 14364.77 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 42.5%。进出口总额从 1979 年的 0.17 亿美元,增长到 2007 年的 2875.33 亿美元。就业人数从 1979 年的 13.95 万人增加到 2007 年的 655.58 万人。近 30 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近 400 亿美元。2008 年深圳市经济外贸依存度为 265%。与一些外贸依存度在 500% 以上的国际化都市如纽约、伦敦、东京已经越来越接近。

开放和改革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国际市场需求带动了中国制造业的长足发展。统计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际市场强大的需求拉动,我国制造业增长是全球增长最快的(见表 1-2)。

表 1-2 工业生产指数的国际比较

国 家	1985	1990	1991	1996	国 家	1985	1990	1991	1996
中国	176	328	111	416	菲律宾	231	451	115	168
日本	118	148	102	98	马来西亚	138	236	111	87
韩国	164	302	110	163	英国	108	123	97	108
美国	112	126	98	117	法国	101	144	99	100
巴西	99	100	97	112	芬兰	116	132	91	121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8。

1985~1990 年以 1980 年为 100,1990~1996 年以 1990 年为 100。

其中在 1985 ~ 1990 年,我国的工业生产指数上升了 86%,1991 ~ 1996 年又上升了 2.75 倍。而在这期间一些国家则出现了负增长。正是由于对外开放,才能使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使生产要素配置更加均衡,使我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资源和要素的分工和循环中去。

同时根据世贸组织统计,在 1980 年,我国的制成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仅为 0.8%,仅为美国的 6%、日本的 7.1%;而到了 2000 年,中国制成品国际市场占有率提高到 4.7%,是美国的 34%、日本的 49%、欧盟的 33%。特别是当加入 WTO 以后,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提升速度陡然加快,我国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名次在 2004 年超过了日本,成为仅次于欧盟和美国的世界第三大制成品出口经济体,占有率达到 8.3%,是美国的 81%、日本的 104%、欧盟的 53%。在 2000 ~ 2004 年间,我国制造业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变化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2003 年、2004 年的年均增速更是高达 36% 和 37%。这些数据表明在中国加入 WTO 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不断加快,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

三、有关对于我国对外开放的评论和认识

2001 年 5 月日本通产省发表的白皮书第一次提到,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日本在世界上第二生产大国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同年 9 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福布斯》杂志举办的企业高层会议上说,正如日本在战后成为“世界工厂”一样,中国将在 21 世纪成为世界工厂。

对于我国制造业的国际评论,国内一些学者也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如吕政(2002)认为,真正的世界工厂不是一般的“为世界市场大规模提供工业品的生产制造基地”,而是“高品质、高技术”的世界生产制造基地。于蕾和沈桂龙(2003)认为,在全球经济化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工厂”已有了不同于过去的新内涵。从国际分工地位的角度来分析“中国世界工厂”问题才是更为可观的。按照在国际分工的地位,“世界工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来料加工型的“世界工厂”。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低廉,跨国公司就把它们作为工业品的生产加工基地。这类“世界工厂”在国际分工生产价值链中处于最底端。第二类是原材料的采购和零部件的制造实行本土化为主,跨国公司控制着研发和市场销售网络。这种类型较第一种类型的层次提高了一步,但仍属于生产车间型的“世界工厂”。第三种类型是既具有研发能力和名牌,也控制着国际市场的销售网络,既在本土进行加工制造,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采购,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一类“世界工厂”才能够获得生产链的最大经济利益。只有成为第三种“世界工厂”,才能真正成为对世界经济有重要影响的经济体。

2004 年博鳌论坛,学者和企业家达成的共识是,我国的制造业是世界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但称中国为“世界工厂”为时尚早,中国更应该被叫做“世界车间”。

其实对于“世界工厂”理解的不同,并不影响客观地评价对外开放给中国经济、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的积极意义。改革和发展是循序渐进的,不能忘记改革开放前中国生产力的落后状况,同时也不能低估即便是“世界车间”这样低级的中国制造业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根据 2006 年的数据,正是由于这样的“世界车间”为当前的中国提供了 3352 万个就业岗位,创造了 GDP 的 34.35%,贡献出口总额的 94.54%,为国家财政提供近 1/3 的收入。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对外开放,我国的产品进入了国际市场的大门,中国缺乏的资源能够从国际市场获取,我国过剩的劳动者能够通过参与到国际经济而得到了尽管低廉但又是急需的劳动报酬。这都是由于中国经济被“嵌入”到国际经济的分工中而带来的。在参与的过程中,我国的农民可以转变为收入更高的工人了,城市化进程加快了,我国的制造业快速地发展了,我国竞争力得到了不断提升。实际上,我国制造业的结构升级也需要“世界车间”层级的演练,从而带来我国劳动者在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技能和经验的积累。

四、关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有关探讨和基本结论

对于我国经济的这种演进,也有一些经济理论做出了解释。例如,现代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认为,全球产业价值链是由发达国家的领先产业形成的,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只能作为链条某一环节的供应商“嵌入”这一价值链。全球经济关联度越高,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可能性就越高,从而越有可能从发达国家先进企业那里获得知识、技术和市场进入等限制性资源。他们认为通过这种不断重复的“嵌入”和外部性的影响,本土企业甚至可以成为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领头羊。当然这种产业学习过程涉及一种企业家精神,要求企业家们能够准确抢占“嵌入”和学习的机遇(John A. Mathews, 2006)。

理论和他国的经验是我们借鉴的依据。我们则更需要深入研究中国自身的特点。在经济发展中时刻也不能忘记我国的基本国情,那就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资源和人口配置失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的人口仍然是相对过多,资源相对匮乏,生产要素和市场的配置严重失衡。在这一基本国情和国际化视野的背景下,我国的比较优势只能是劳动力和人力资源。要完成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任,必须也只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发挥中国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走国际化的必由之路。

回顾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会进一步加深对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也曾多次尝试过“经济跃进”,但都没有成功。而在最近的 30 年中,中国却成功了,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社会内在机制的问题所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必然会导致经济萧条和危机周期性地出现。经济持续增长不可能实现。在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经济发展

中则主要是由于资源短缺的约束所形成的经济周期也会经常出现,而不得不放慢经济发展脚步,调整经济发展计划。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也曾梦想和制定过经济腾飞的蓝图。我国也曾有过多经济大跃进的实践,但每每都是由于资源约束而导致经济失衡,最终不得不停止,进行经济调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是有效需求的约束,社会主义的约束是资源的约束,都是硬约束。因此所有的努力都没有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都存在着经济周期。帝国主义国家发展的初期靠的是对外侵略和掠夺。而在过去的 30 年中,我国经济的成功跨越则靠的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使我国的资源配置超越了疆界,经济增长找到了国际市场需求的巨大引擎,通过国际市场交换打破了资源和市场约束的瓶颈,实现了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

还注意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 30 年中,每当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而发现结构失衡的苗头时,资源和市场失衡问题最终都会从国际化中找到出路,都会由于国际市场的广阔空间而使国内问题逐步消化。资源和市场逐步向国际拓展,造就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30 年的伟大奇迹。正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所造就的国际经济结构的互补性,才赋予了中国经济赶超的历史机遇,才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可能。并且使中国在未来的经济继续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因此,保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继续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了我国融入国际经济的循环的深度,这才是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外开放绝不是我国的权益之计,而是应当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第三节 我国对外开放基本经验的总结与未来的目标

实践已经证明,由于我国自身生产要素配置失衡的先天不足,对外开放使中国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这将是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必须正视的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现在需要总结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对外开放呢?

一、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经验

在总结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有三点特别要注意。一是从外部讲,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导致的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规律在发生作用,即国际经济优化运行的内在要求需要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区域。这就是我国经济超越的历史机遇。但可以转移的国家很多,又为什么仅仅是中国呢?这就需要从我国的内部去寻找原因。第二点就是我国的内因,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和动力,即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劳动者之一。他们的基本品质和特征是勤奋、勤俭、任

劳任怨、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只要有适合他们生存和发挥的土壤,他们就可以创造出世界奇迹。第三点就是也要看到体质和环境的因素,世界经济规则是发达国家制定的。我国在融入世界中还存在有许多体制和文化上的障碍。比如传统的文化导向并不鼓励致富,再好的劳动力也不能转向经济建设第一线。体制设计不科学,大锅饭使劳动者缺乏生产经营积极性。从中国历史上看,凡是有了适合中国劳动者自由发挥的历史和体制环境,中国劳动者的潜质才能发挥,中国就会发展和强大。因此改革不适应对外开放的体制是深化开放的重要动因之一。

对外开放使中国人有可能抓住历史机遇,而改革破除了体制和文化障碍,才能使中国人真正能够实实在在地抓住机遇。中国沿海区域经济发展较快的主要经验就是在对外开放的机遇下,大胆改革,成功地把大批的市场主体引领到融入国际经济的运营中,充分发挥了中国劳动者的潜能。这是最基本的内因。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归纳总结出在对外开放中,中国经济,特别是沿海发达区域经济成长、发展的基本路径:

中国自身生产要素配置的失衡→对外开放→嵌入国际经济分工→投融资,推进体制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要素聚集,企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本土企业家群体的形成,不断深化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提升国际竞争水平→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在这其中有三点经验特别重要:

一是经济活动的国际惯例和规则是发达国家制定并竭力维护的,中国只能通过思想的解放和体制的改革来适应,去创造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局部环境。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面前,劳动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固然重要,但还需要有与国际经济规则接轨的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以及人的思想观念的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价值观等与国际环境的差异太大。这就需要中国内部的改革,因此只有改革才能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开放与改革必须配套推进。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创造一个在制度、规则和文化上与国际环境接轨的“小环境”,吸引资本、技术等国际生产要素的进入。通过改革与建设,来推进国内硬件环境的建设和软环境的改变,从而使外来投资具有认同感,加速产业聚集,加速中国自身的产业升级。

二是区域要有较高的自由度。因为有了自由度,就会破除本地文化的排他性,就有了包容性,就容易吸引外来的要素聚集。有了自由度,才能激励自主创新。有了自由度,才便于生产要素的便捷进出,从而实现核心资源和要素的国际化配置。在实践中,中国政府也正是这样做的,在中国一些沿海城市实行特殊政策,不断深化改革和发展,不断完善要素聚集的短板,促成了国际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实现了经济腾飞。这些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后的特征有很多,但有两个最重要的指标非常突出,那就是:一是城市环境与国际接轨的程度高,二是企业家云集,企业密

度高。

三是在融入世界经济循环的进程中,实现产业赶超的主体最终应该是本土民营企业。在实现赶超中有两种力量驱动,一是本土企业,另一是外企。最初的产业聚集有可能以外资为主,但最终要依赖本土企业。在以往的国际经验中,日本、韩国等主要是依赖本土企业驱动。巴西及其他东亚国家主要依赖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计算制造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指数发现,主要依赖本土企业赶超过程的日本等国在上游产业获得成功,而巴西等国则没有获得成功。其根本原因是必须把握只有本土企业成为实现产业赶超的主体,才能实现产业升级,这是成功的经验。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对外开放做得好的区域都有这样一些共性的东西。比如全面的开放,如深圳、上海浦东以及苏州工业园的开放都是国家级的战略决策,开放层级高,影响面大,有利于要素聚集和市场的辐射。还有就是改革中的制度创新,三个地区都在制度创新上着力,在经济、社会管理体制上的创新,实行“小政府,大社会”,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走向“企业本位”,最大限度地与国际接轨,从而使区域环境成为亲商兴商的宝地,安居乐业的沃土。

对外开放的基本目标是把本地经济“嵌入”到国际经济循环中;基本方法是投融资和制度创新,从而去营造与国际接轨的软硬环境;主要策略是打造区域特点,发挥比较优势;而核心也是检验最终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志就是生产要素的流入与产业聚集的密度。根据以上的分析与总结,从总体上看,在中国,区域经济能否形成国际产业转移并聚集的凹地要具备以下一些基本的要素:

- (1) 具有在国际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成本优势,包括生产要素成本和物流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
- (2) 具有在国际范围内的交易成本优势,制度优化,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易成本;
- (3) 具有在国际范围内的市场优势,包括国际市场、国内腹地经济两个大市场的优势;
- (4) 具有在教育和科技人才方面的优势;
- (5) 具有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优势;
- (6) 具有创业文化和具有包容性和自由度较高的环境优势,从而对企业家有较强的吸引力。

二、对外开放的 3 个层次及我国对外开放的更高目标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经济后发国家融入世界循环必须要经历或者说必须要跨越 3 个阶段,那就是:

第一阶段是通过外资的带动来嵌入世界经济产业链,而后发国家仅仅是通过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来被动地参与国际经济循环;

第二阶段是本土企业在技术、装备与经营管理上的升级,利用比较优势与外资企业共同甚至独立参与国际竞争;

第三阶段,也是最难的阶段,那就是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在国际市场上发挥自身的竞争优势。

在过去30年中,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虽然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在不断深化。通过更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表明,在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我国的制造业也在从低端向高端的逐步提升。这同时也说明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技能也是在逐步提高的。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是陆续将纺织、服装等产业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趋势。到了90年代后期,逐步转向电子产品的制造。1997~2000年间,纺织业实际利用外资从18.59亿美元下降到13.68亿美元。而同时,电子工业和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分别从29.44亿美元、26.59亿美元增加到113.6亿美元和45.94美元。在这之后,发达国家和地区又开始将部分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向中国转移。在我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中,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如资金和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出口在不断提高。1978年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不到100亿美元,到了2004年就达到3234亿美元。在2000~2005年间,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43.1%,到2005年,全年完成高技术产品出口2182亿美元。最近几年,在国际制造业不断向中国转移的过程中,一些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也逐步将工作重心转向中国。

更重要的是经过对外开放的洗礼,我国本土的企业和企业家也逐步成长起来,学会了国际运营的规则,增强了国际竞争的能力,铸就了在国际大市场上拼搏成长的资质,走出了国门。在这期间,也造就了一些像海尔、联想、华为等一些国际级的本土企业,这些企业在发展中不断提高着国际竞争力。30年的发展实践证明,曾经落后的中国已经在经济上成功地实现了嵌入世界经济的产业链,本土企业也在国际经济运营中提高了竞争力。从国家层面上看,我国已经完成了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第一阶段,已经进入并不断提高着第二阶段的运营水平。

在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嵌入”全球经济的特点,即主动地对外开放,被动地被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带动而来的。这主要是为发达国家已经造就的产业格局和制定并在竭力维护着的国际经济规则决定的。你不能改变它,只能适应它。因此中国对外开放初期的主要特征是投资以外资为主,经营管理以外来的经理人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经济增长以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为主。形成这种局面的基本原因是国际经济需要中国优质而又相对价廉的劳动力。我国经济在“嵌入”国际经济循环的起步阶段只能被外来的力量所带动。但由于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奋,使中国经济很快由被动“嵌入”,到主动出击,最终导致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越来越深。

以这种模式发展起来的我国沿海区域,市场主体最初集聚的主要是外来企业。

后来本土企业在与外来企业的合作、合资和竞争中不断地学习和提高,以及大批在外来企业中被“训练”出来的中国白领陆续出来独立创业,使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企业成长起来,并且独立地进入到国际市场竞争的主战场。使“以外为主”,逐步进化为中外共同发展,最终完成“以中为主”的蜕变过程。

还需要注意的是,对外开放的前两个阶段都相对比较容易,因为,中国仍处在 U 形曲线的底端,在这两个阶段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形成天然互补。发达国家需要“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来实现经济的互补发展。世界经济需要中国经济的融入来保证持续增长而促进协调发展。但到了第三阶段,也是最难的阶段,那就是自主创新。这是因为在中国内部,自主创新涉及文化、体制、机制上的根本改革;而在外部由于产业升级会形成与发达国家的竞争而遇到巨大的牵制。但是必须看到,没有这种突破,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因此,自主创新必然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更高目标。我国对外开放的最高目标应当是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循环,我国有 13 亿人口,理应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融入世界必然会影响到冲击世界,但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国的融入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服务于人类进步的融入。

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在对外开放方面的挑战是,在面对全世界对中国发展的观察和质疑下,中国人不但需要用辛勤的劳动和艰苦的实践证明:在人类进步的进程中,中国人始终是人类文明建设和发展的辛勤耕耘者,中国始终是一个人类大家庭的和谐社会的建设者;还需要挖掘和弘扬中华文化的智慧和影响,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是世界经济良性发展的促进者,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在我国 30 年的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有一些区域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们的经验主要有哪些呢?

第四节 深圳、苏州、上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模式和主要经验

在我国经济 30 年的高速发展中,有一些区域在开放中铸就了对外开放领军者的地位。这些区域的经济的发展更为突出。借鉴它们的经验对后发地区的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深圳的主要经验

1980 年,在对外开放之初,中央政府就确定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定位,明确提出了“四个为主”的建设方针:

- (1) 建设资金以吸引和利用外资为主;